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美】卡伦·霍妮 著



06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卡伦·霍妮 著
冯 川 译
陈 维 正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编 者 的 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已成为

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然，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7年5月

中 译 者 序

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显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仅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聚论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洛伊德本人和由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击，能够吸引这样多的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鸵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

是弗洛伊德本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本身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兰克、赖希、霍妮、沙利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弗洛伊德学派(The New Freudian School)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批判和修正。而卡伦·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最重要的中坚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始终充满了好奇的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

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和门生，而霍妮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妮1913年获医学学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妮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并于1938年加入美国籍。在美国，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妮于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修正与批判。此后，她进一步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同行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会的名称表明了决心把这门仍属年轻的新科学继续推向前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

里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在本书中，霍妮反复强调：“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作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为什么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糊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这一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尖锐，无怪乎那些恪守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

人要把她视为异端而加以驱逐。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妮对神经症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她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症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那样多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本书中，霍妮运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经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一方面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但更多地却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

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霍妮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而且实际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文化的乃至社会经济的批判。

霍妮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

就接受了这一病毒。”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妮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妮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矛盾，这些无法调合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

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焦虑的概念使霍妮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相关联，从而使她的思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而在她的晚期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则是异化概念。所谓异化，在霍妮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的，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identity)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霍妮的神经症概念日趋成熟后，她不再简单地把神经症视为各种病态倾向的冲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在异化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态倾向始终反对着健康的倾向。

总之，霍妮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源于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

亡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霍妮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个人放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导致人格的全面崩溃强。这就是说,由于大大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社会条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妮认为,个人要想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却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行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通过以上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霍妮作为一个医生和心理学家,无论对西方社会作了多么尖锐的批判,最终却并不主张诉诸革命以解决现代人的困境。她更多地仍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使个人适应外界的治疗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无怪乎有的评论家总结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最大胆最直率地反对正统精神分析保守倾向的人,到头来却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疗最传统的应用。”

霍妮于1952年12月4日死于纽约。她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年）、《自我分析》（1942年）、《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年）、《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年），以及她死后，由她的门生编辑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年）。她的基本思想，在本书中皆可初见端倪，而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心态的精采而透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说来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

冯 川

1987年4月于

四川大学

绪 言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刻画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①患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所作的尝试上；放在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焦虑，以及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实际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但我与许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并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并不赞成把病人后来的反应看作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

① neurotic, neurosis: 常译作神经症、神经机能病、神经官能症和神经病等，本书交替采用了以上译法。 — 校 注

时期的经验与病人后来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精神分析专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注意到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它们却并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障碍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在其中生活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母亲或拥有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可以说是个人的命运；但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专断的母亲或自我牺牲的母亲。同时也仅仅因为存在着这些文化条件，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该人往后的生活发生影响。

当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后退到背景的位置上。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只有根据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许多基本问题都作出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之内涵，病态的犯罪感之意义等），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究竟是否还称得上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不能算作精神分析。但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路，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我相信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论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即容易使我们在一切神经症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迂腐的、食而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共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使精神分析既成为一种治疗实践又成为一种理论方法。

这种说法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否是一种阿德勒式的理论。不错，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曾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有一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理论却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甚至对心理过程的富于创造性的洞察，如果从片面的方向上去探索，如果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会变得枯燥乏味。